

“送礼中国”越红火，理性社会越遥远

文 辉

中国作为最讲究礼仪的国度，大约是举世公认的，由来已久的礼仪之邦之说便是明证。

虽然“礼之用和为贵”之类的礼赞吟哦已不再令如今的大多数国人所耳熟能详，但是丝毫也不妨碍送礼之风弥漫。眼下正值年关，国人的“礼性”行动正在规模空前地展开。送礼正如当前的春运一样，算是一项全民总动员的盛事了。

晚辈要给长辈送礼，孩子(家长)要给教师送礼，企业要给关联单位关键人物送

礼，方方面面要给官员送礼，同在官场，下级更是挖空心思忙着给上级送礼。政府及相关部门呢，大约也没有闲着，正在本地、异地大肆举行各类答谢宴会、联谊活动，大量派发礼品礼金。一片送礼的折騰景观，使年关更为忙碌、更为紧张、也更为混乱。正常的生产经营、正经的公共服务可以为之暂歇，一切的活动安排围绕着送礼这个中心展开。有兴趣者不妨调查一下年关的私务、公务活动，恐怕正好印证了所谓“天下熙熙皆为礼来，天下攘攘皆为礼往”。

《礼记》有谓：“夫礼者，自卑而尊人”，“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

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其中所体现的礼节仪式、交际原理、社会秩序、和谐文化，应该说不无可取之处。作为中国人，本着取其精萃去其糟粕的精神学习之、运用之、实践之，对于提升道德修养，润滑人际关系，丰富人生旅程，减少成长遗憾当是大有裨益的。至少从知恩图报的意义上讲，笔者并非一概反对送礼，但是，对于愈演愈烈的送礼之风所成就的“送礼中国”，却不得不感惑纠结。

综观时下之“礼道”，恐怕起古代之礼学大家于地下，也只有目瞪口呆的份儿了。一是送礼的码子越来越大。无论是年

节之礼，还是人情往来之礼，正在从一种必要的人情调节剂变成沉重的人情债务。不客气地说，此项开支大约正如CPI的猛涨一样，正在成为中国公民的一大负担。二是送礼的动机则越来越可疑。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这曾经是吾国作为礼仪之邦礼的精华所在。但是，如今送礼的大多并非发自内心，更多的是有所求而送，有所利而礼，其间的情状真个是，说不尽的钻营之术、谄媚之态。纯洁人际关系的芳馨，已被以“礼”取人的恶臭所污染。三是送礼越来越成为腐败的代名词。送礼的钱袋，已经大

步跨越了公民私人的腰包，而企业的公关费用、政府的招待开支之类正大唱其主角。不仅使市场秩序、官场清仪之类大受冲击，而且正在成为腐败的渊藪。最具讽刺意义的是，不论有多么方面出台多少规定，也不论腐败的典型案件中有多么深刻的警示教训，都挡不住送礼者的脚步，更挡不住衮衮诸公们的收礼欲望。

送礼成风，不仅大大有违建立文明国家之祖训，也与公平公正的现代社会的诉求背道而驰。对此项盛事的观察，我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送礼中国”越红火，理性社会越遥远。

冰点时评

逐渐适应百姓的怀疑和挑剔

邓聿文

新华社下属的一家报纸近日做了一组有关社会信任的报道，网络关注度颇高。该报道用了近几年发生的大量事例，包括前不久的钱云会案，直指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用该报道中的一句话说，就是“假的我们不信，真的我们也不信。”

社会信任是一个社会维持正常运转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普通的信任不复存在，后果的确非常可怕。因此，我们需要关注信任问题，不能让不信任像瘟疫一样到处扩散。但由此是否就可得出结论，所有的不信任都不好？不是的。在我看来，对政府的怀疑和不信任未必就是坏事。

道理很简单。现实中的政府一般都处于强势，而政府又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既然是人，官员也就具有人的优点和弱点，其道德不会比普通人高尚，因而，在巨大的权力诱惑面前，难保他们不会利用行使公权力的机会，以权谋私，出台损害社会公益的政策和措施，尤其当这种权力缺乏有效监督时，更是如此。退一步说，即使政府的施政动机出于善的考虑，由于人的理性的局限性，也难保结果对行政相对人不造成损害。现实中，不少政府行为都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结果却是假公济私。

所以，在一个举措出台时，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其行为，怀疑其动机，竭力找出它的害处来。不仅如此，还要设计一套制度和体制，对政府的“必要之恶”加以限制，使之不超出一定的范围。只有这样，才能迫使政府随时处于民众的监督下，最大程度减少政府打群众“坏”主意的机会，从而去施廉政，达善治。

目前的问题是，我们的政府架构设计和运作体系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假设基础上的，认为管理者具有比普通百姓更高的道德，所谓“爱民如子”，因而在政治架构的设计中，也就缺少实质性的权力制约和制衡内容。尤其是基层政府，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其一言一行都被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如果政府做一种“不可抗的超自然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既无须向百姓解说，也不用征求他们的同意或意见，而百姓除了被动接受，别无选择。那么，政府既然是出于好心办好事，也难以得到他们的理解与认同。

因此，人们看到，尽管执政党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颁布了很多法律和制度强化对官员和政府施政行为的约束与监督，但民众对政府及其官员，尤其是基层政府及其官员的不信任有增无减。有关调查显示，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最高，省级次之，地级再次，县级最差。不仅民不信官，官也不信民，官在民看来是贪官，民在官看来是“刁民”，两者互相影响和强化，彼此猜忌，致使社会的裂痕越拉越大，最后的结果，就是官民之间的对立和对抗。

要改善政府的公共治理，重建官民互信，须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政府应当在行政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增强公开性与透明度；二是政府和民众在公共事件的讨论和行动中，要有意识地遵循公共理性；三是全社会范围内，培养对话精神，形成良好的官民间沟通机制；四是培育和建立一支独立的第三方仲裁力量。

如果处处用怀疑的眼光去挑剔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才能够在管治中努力改善自身的行为，以良好的政绩让百姓来信任自己，从而最终成为“好人”。以此建立起来的官民关系，才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而当前的关键，是政府要逐渐适应百姓的这种怀疑和挑剔。

百姓说话

辛 杰

广东湛江市市民反映，他们每年需要向户口所在地派出所交纳12元“户口年审费”，否则将被罚款50元。中山派出所和寸金派出所所长均表示，这12元是治安联防费，这一说法得到湛江市物价局证实。但早在2006年，湛江市公安局已下发通知，要求全市各派出所不再集中进行户口本核对；严禁以核对为由搭车收取治安联防费，严禁以不核对为由罚款。（《京华时报》1月24日）

中国人证件多，由此衍生的“办证经济”自然也就格外火爆，这自然促使许多

天价补贴何以年年遭批年年获批

惠铭生

广东省人大21日开幕，代表报到时都收到《广东省2011年省级部门预算草案》。

有代表发现，按此预算，省8所幼儿园一年花费超过6863万元，比去年有所增加。省财政厅一位处级干部解释，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幼儿园是相关机关的一个附属事业单位。（《羊城晚报》1月22日）

读罢这则新闻，笔者深以为耻，甚至认为不屑一评。为何？

一是机关幼儿园该不该得到“天价”财政补贴，实在不值得辩驳。但是，广东有数家机关幼儿园却很“特殊”。说它们特殊，一是因为这几家幼儿园迥异于企业办、民办幼儿园，不仅有编制，而且每年还能享有“天价”财政补贴。二是，这样的机关幼儿园是为公务员免费开办的，而其他百姓的子女入学，却需交纳高额赞助费。百姓的纳税钱只泽惠“官二代”，而非社会公众，这样的“天价”财政补贴缺乏正当性。据媒体分析，广东这几家机关

幼儿园每个幼儿每年要补贴2万元！而普通百姓的孩子上幼儿园，每年却要交一万甚至数千元学费，试问，社会公平与正义体现在哪？

二是舆论批评乃至人大的尖锐批评，批了10年又有何用？广东机关幼儿园获“天价”财政补贴一事，实乃“旧闻”，媒体年年重提，不过是“炒新闻冷饭”。笔者在网络搜索得知，自2003年开始，广东数家省级机关幼儿园在人大会上通过财政预算获取“天价”补贴问题，几乎年年是媒体热议焦点，年年引发潮水般舆论批评，年年遭受一些人大代表的“炮轰”，年年却顺利获批，至今历时已近10年。然而，机关幼儿园的财政补贴不仅岿然不动，反而在批评中高歌猛进，逐年提高。比如，2004年补贴2000万元；2009年补贴6000万；2011年则达到近7000万元。

机关幼儿园为何能获“天价”补贴？2004年，官方解释是“体制原因”；2010年解释为“历史遗留问题”；而今年又解释为“历史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有

解决“啃老”缺的不是法律规定

谢昱航

江苏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对《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草案修改稿)》进行了审议，修改稿增加了对“啃老”现象的规定：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要求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以物业或者其他理由，骗取、克扣或者强行索取老年人的财物。（综合近日媒体报道）

时下“啃老”现象的确已成为一个不能小视的社会问题。有调查表明，65%的家庭存在“啃老”问题。但是，江苏省的这一新规，对缓解“啃老”现象却没有什么意义。

对有独立生活能力成年子女的资助要求，老年人有权拒绝，实际上法律已有了明确的规定。根据《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解释，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限定在未成年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范围内。也就是说，根据现有法律，老年

人已经有权拒绝有独立生活能力成年子女的资助要求，地方法规再重复这一规定，纯属多余。至于骗取、克扣或者强行索取财物，不光是针对老年人，针对任何人都违法，也用不着再重复。

法律早就赋予老人拒绝被“啃”的权利，但“啃老”现象还是这么严重，充分说明这不是法律规定能解决的问题。“啃老”现象日趋严重，其实是一个无奈的问题，一方面，是“被啃”老人的无奈，一方面是“啃老”者的无奈。

应该说，很多老人是情愿“被啃”的，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在中国传统中，父母子女之间，你我界限分得不是很清。一般认为，父母的就是子女的。更有很多父母，总以能给孩子提供好的生活条件自豪，不能给孩子创造生活条件的父母，内心未免内疚。如果说子女生活没有着落，自己还能过得去的话，有几个老人不愿意给子女帮助？不能排除，一些子女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父母本不愿纵容子

女的行为，但扯不断的亲情，让他们无法强硬地拒绝。而拿起法律武器，则属于最强硬的行为了，一方面，家丑不可外扬，另一方面，陷子女于不利。所以，法律再强化他们的权利，也未必管用。

对于绝大多数人说来，如果自己能有办法自食其力，是不会总“粘”着父母不放的。在“啃老”现象日趋严重中，我们不能忽视其映射出的就业难问题。没有工作，就只能靠父母帮助过日子。对于这些因找不到工作而陷入困境的年轻人来说，求助父母是无奈的选择。

双方的无奈，实际反映了解决“啃老”问题的方向。一方面，“啃老”更多还是属于“家务事”，当事人要解决，其实不缺少手段，更多的是当事人愿不愿意下决心解决的问题，而外力干预，往往难起作用。另一方面，解决“啃老”的根本之道，还在于发展经济，发展民生，让更多的人能就业，同时加大对失业者的社会救济，让其无须“啃老”。

我与北大“帐篷哥”惺惺相惜

柳 哲

最近，北京多家媒体报道了《帐篷哥夜宿清华旁听北大》的消息：“出生于1990年的赵铭（化名），去年参加了高考，并顺利考入山东一理工类高校。一个学期后，他主动退学来京。目前，赵铭每天都会去北大旁听课程，为了省钱，他每晚都在清华大学青年公寓楼道中搭起帐篷过夜。”

看完报道后，不禁想起15年前，我在北大旁听的一段特殊经历。1996年3月14日，26岁的我，带上父母积攒多年给我娶妻成家的3000元钱，怀揣着梦想，只身来到京城，开始了我的北大寻梦之旅。仅过了几个月，手中的3000元钱就所剩无几了。住宿也成了难题，正一筹莫展之际，我偶然发现了北大第二教学楼的后面，有一间闲置不用的四五平方米的小储藏室，我就找来砖头和木板，搭成了一张简易的床铺，并取名为

“静心斋”。白天在课堂上听课，晚上回到蜗居里，在烛光下写东西，尽管没有暖气和水电，墨水瓶里的墨水有时都结了冰，我仍怡然自乐。

可惜好景不长，后被校方有关人员发现，只得搬离。为了生计，我不得不在学习之余想办法挣钱。首次打工是帮一家公司抄信封，两天就挣了120元，为乐了好一阵子。有一次，我与一位民工套近乎，得知拆房就去整理砖头，一块能挣3分钱，课余时间我就去整理砖头，几天下来，手指头都磨出了血……

后来，在北大教授楼■■、张兴根等老乡的帮助下，我在北大出版社找到了一份校对工作，生活有了保障。北大的旁听传统，让不少求知若渴的有志青年，在这里梦想成真。他们有毛泽东、沈从文、瞿秋白、陈毅、柔石、冯雪峰、杨沫、金克木等等。

2001年3月22日，我写了一篇《北大边缘人的故事征稿启事》，翌日在北大三

角地张贴后，“北大边缘人”不胫而走，这一称谓很快就成了在北大旁听、考研等游学群体的代名词。我倡导的北大游学活动，也得到了北京大学界泰斗张岱年先生的认可，他欣然题词以示支持：“追求真理，振兴中华”！

如今，“帐篷哥”媒体走红后，境遇却不佳，已不能继续在清华“安营扎寨”。我通过媒体的朋友找到了他，并请他来家里做客，将我在北大10余年的旁听经验与他分享。我与妻子商量后，决定临时为他提供食宿，帮他度过难关，还鼓励他半工半读，以早日结束“帐篷求学”生涯。

晚餐上，“帐篷哥”夸我妻子做的饭菜是他来京后吃过最好的饭菜！一顿普通的晚餐，竟然引起了 he 如此的感慨，让我心酸不已。

从“帐篷哥”身上，我看到了众多旁听生的影子。作为曾经的北大游学中的一员，我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伸出援助之手，让他们梦想成真！

你家的户口本有没有年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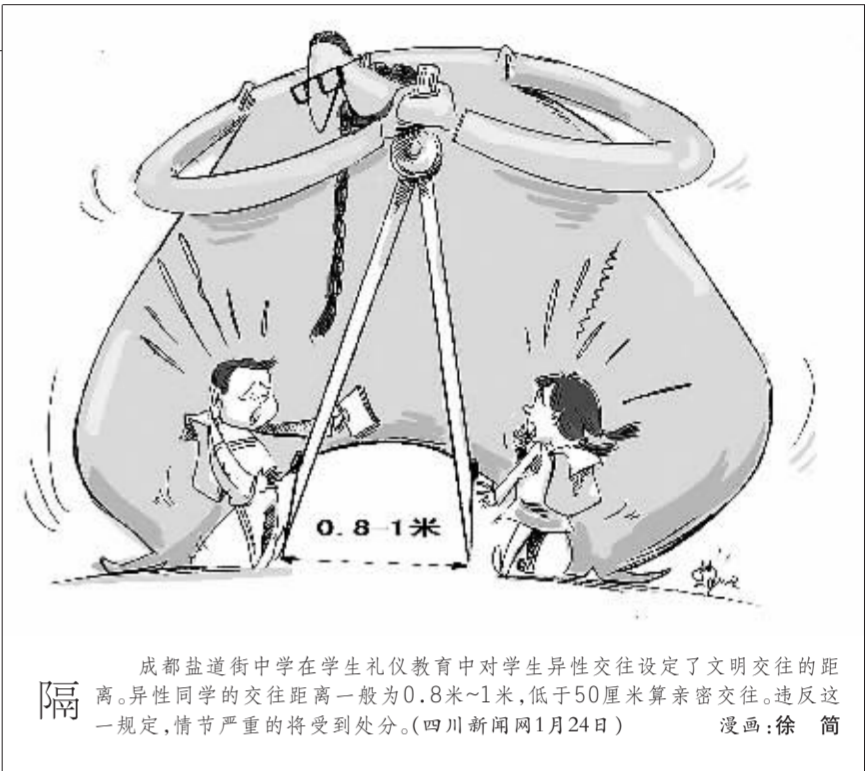
职能部门挖空心思给管理对象办证发证，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广受诟病的“只收狗钱不办狗事”的城市“养犬证”。但是，办“证经济”办到现在，好像绝大部分资源都已经挖掘殆尽了，要想做大“办证经济”、广开财路，除了继续创新办证文件之外，还需要对目前的“办证经济”体系进行升级，“审证经济”应该就是这种“办证经济”升级后的新型经济。

作为“审证经济”的代表，以“治安联防费”名义收取的“户口年审费”，至少能给收费者两种启发：第一，“审证经济”是源头活水，不像初始的“办证经济”那样，只能一次性收费，可以持久地

年复一年地收取下去。而且，由于审证部门拥有掌控该种证件的权力，这笔费用是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免交的。譬如，有好多户籍在湛江、而举家在外地生活的人，也不得不将户口本邮寄回去接受审验。

第二，“审证经济”的适用范围相当宽，可以说，有多少“办证经济”，就有多少“审证经济”，如果全都按照“户口年审费”的审证逻辑收费，那将是一笔数额相当巨大的收入。譬如“身份证年审费”、“结婚证年审费”、“养犬证年审费”……

和“办证经济”相比，“审证经济”更加近似于无本生意，至少连“办证经



过度医疗的危害人们知之甚少

张田勘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前年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透露出几个数字：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

过量输液其实反映的是一个非常简单但又尖锐的问题，医药是有害的，只是，专业人员不愿提及，而公众意识不到，也难以了解内情。

早在1860年，身为医生和作家的霍尔姆斯就向美国马萨诸塞州医疗协会致函，对当时的医药作了评价：“我坚定地认为，如果全世界的药品，像现在使用的这些，要是都能被沉入海底，那将是全人类的幸事，同时也是鱼类的不幸。”霍尔姆斯认为，人类文明迄今为止全部的“治疗”和“药品”的功效，放到一块儿，就是一个词——“有毒”。所以，医药带来的害处多于带来的好处。

尽管有很多人并不同意这个结论，但是，重温这个观点无异有崭新的意义。中国的过度治疗，包括滥用抗生素和过度输液，已经在为“医药带来的害处多于带来的好处”做出生动的解释。世界卫生组织的用药原则之一是，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但是这一原则早就在中国被突破，人们最常見的治疗方式之一，就是输液和使用抗生素。

输液的危害之一是，发热反应。输入致热物质、输液瓶清洁灭菌不完善或被污染等原因，都会导致病人发热、打寒战和发热，严重者高热达40~41摄氏

度。危害之二是，导致肺水肿。因为输液速度过快，短时间内输入过多液体，使循环血容量急剧增加，心脏负担过重而引起水肿，严重者有生命危险。危害之三是，静脉炎，因为长期输注浓度过高、刺激性较强的药液，或静脉内放置刺激性大的塑料管时间太长，可引起局部静脉壁的化学炎性反应，也可因在输液过程中无菌操作不严，引起局部静脉的感染。危害之四是，空气栓塞。原因在于，输液时空气未排尽，橡胶管连接不紧有漏缝。只要少量空气进入静脉，患者就会感到胸部异常不适，随即发生呼吸困难、严重绀紫和缺氧，并可导致猝死。

专业人员并非不知道这些危害，只是不愿对病患者和公众说出而已，原因在于医药的巨大利润。即使有个别患者坚持要输液，以医生的理性和人文关怀，也应加以劝阻，并且针对病情下医嘱。如同霍尔姆斯所言，医生的工作应该是为病人提供精神上的支持，鼓励他们养成明智、健康的生活习惯，而不是鼓励他们用药和对他们多用药。

造成抗生素滥用和输液过度的原因还在于，医生对疾病的理解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对药物治疗机理的理解却没有太大的发展。医生们顺理成章地认为，科学给他们提供了许多神奇的新药，在对病人使用时，没有必要进行任何复杂的风险评估实验，也没有必要仔细权衡利弊轻重。

世界上不缺药物，真正缺乏的是用药的思维和方法，以及对人的关怀。少用药、巧用药和最好别用药，应当是医生首要的治疗原则。

无知无畏的过度输液

流 沙

感冒发热高烧不退，听从医生建议输液，三天药量，瓶瓶罐罐很沉的一大袋。拎着注射液路过大厅，遇上—熟人，该医院资深药剂师，与她聊了一会，她看我手中这一袋子药水，轻声说：“不就是—个感冒，能不输液就不输液。”

想起她全家都是“不输液者”。她女儿今年11岁，竟然坚持只有两次的输液记录。而她自己和丈夫，可以做到不服药，只服用姜汤，也可以痊愈感冒。记得—次她在席间“数落”大家，说你们—感冒就吃药，而且吃的竟然是抗生素，体温上升，就要求医生输液，—输就是三四天，你们全部是在玩命。

我们都不懂药理，对她这“数落”听过，也就—笑了之。直到看到—具数据，当真吓人—跳。2009年中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瓶的标准。与之还有一个相关数据，中国人的抗生素用量是美国人的10倍。这个数据公布后，卫生部说不准确，说从生产环节设计没有那么多，但这个数据来源于医院的使用环节，反而更令人信服。

中国人生病特别喜欢输液，其实是一种“被输液”。输液被医生美化成见效快的医疗手段。殊不知在输液过程中，孕藏着难以估量的风险。医生的穿刺、滴速、注射液质量、输液器质等等，众多的环节中只要有一个发生问题，就可能危及病人的生命。有数据称，在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中，有8成以派出所编回已经习惯于伸出去的手吗？

上属静脉输液引起的。

但是，这种风险没有人提醒我们，我们“无知者无畏”。生了病走进医院，医生简单问诊，然后就利利地开输液单。每个医院不够用的就是输液大厅，里面热闹得像个菜市场，人人手—插—针—头，头上挂—瓶—盐—水，“享受”着被输液的“乐趣”。

我们小时候（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鲜有输液的治疗手段，凡采用输液者，大都是得了重病。而如今，嘴巴里生个口疮，医生也会给你输液，或者病人“自告奋勇”要求输液，输液成了一件平常事。

中国人每人输液8瓶，人才才2瓶多，我想中国人的身体也是肉长的，不会比外国人更耐药。为什么国外对输液谨慎之又慎，而中国人“乐此不疲”，而鲜有关于输液风险方面的宣传？这背后其实暗藏着一个巨大的“利”字，试想—下，中国13亿人，每人8瓶，这是一个天量，由此还有输液的玻璃瓶、软塑袋、注射器等等，那是一个何其巨大的市场？从原料供应商，到生产商再到医院以及医生，—每个环节都有着巨大的利益纠葛其中，谁又肯放手？

医生经过专业培训，对病人会更加懂得输液的风险。但是他们不会说，而且还在推波助澜。病人就“无知者无畏”，以为输液是21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也是最安全的发明。这些—生—病—就—要—“输液”的病人，又有多少人接受过公共医疗机构关于药理的宣传，又有多少人得到过医生的风险提醒？